

みんなくりポジトリ

国立民族学博物館学術情報リポジトリ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中越国境民族文化振興与相互的考察

メタデータ	言語: zho 出版者: 公開日: 2009-04-28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袁, 少芬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https://doi.org/10.15021/00001565

中越边境民族文化振兴与经济互动的考察

袁 少芬

广西大学

- | | |
|--|---|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1 从文化角度思考少数民族的发展2 中越边境的历史文化特点与民族特点<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2.1 地理区位与民族构成2.2 中越两国有着悠久而密切的历史文化关系2.3 中越边境地区大都是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2.4 多民族文化的结合部2.5 中越边境地区是中国通向东南亚国家的重要通道,也是中国与东盟经济市场的结合部3 京族的经济发展与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3.1 京族丰富的民族文化与传统社会3.2 京族地区经济与文化的互动3.3 经济发展与京族传统文化的淡化流失3.4 保护开发京族民族文化资源的试验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4 其他考察点综述<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4.1 凭祥边村壮族农商文化开发研究<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4.1.1 边村与农商文化4.1.2 农商文化的成因4.1.3 农商文化的功能4.1.4 农商文化的开发试验4.2 那坡县水弄苗族教育文化振兴<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4.2.1 水弄苗族社区特点4.2.2 振兴苗族教育的试验4.3 靖西旧州街壮族民间工艺品绣球的发展及越南高平省广渊县福莲乡安依族传统手工业发展的考察<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4.3.1 旧州壮族绣球发展之路4.3.2 福莲安依族发展手工炼铁业的典型4.4 越南新清乡的比较研究点 |
|--|---|

1 从文化角度思考少数民族的发展

2000年岁末,我接受了主持为期三年的福特基金项目:“中越边境民族文化振兴与经济发展互动研究”。该项目缘起于这样一个严峻的思考:面对有着特殊的历史文化特点的民族地区,面对有着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的少数民族,却常与贫困共存的现象,使我们深深触痛;人们也更多地关注到文化对经济的作用,有人将文化喻之为经济的灵魂,这也引发了我们的深深思考:经济发展处在暂时滞后状态下的少数民族,如何利用自己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来改变自己的贫困落后状况?经济发展了的民族,如何保持自己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所以我们提出了少数民族的文化振兴与经济互动的问题。

这里所提的“文化振兴”其内容主要包括:通过发展民族教育和普及文化科学知识,提高当地民族的文化素质,保护优秀民族文化;开发民族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产生经济效益,拓宽扶贫途径;利用民族文化资源的社会效益功能,增强当地保护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能力,抵制“现代文明病”。

课题的设计,选择在中越边境地区,以不同文化发展类型的不同民族典型村点作为考

察和比较研究点。为什么选择中越边境地区作为考察地呢，因为边区可以说是最有代表性的民族地区，具有更多的发展特点、难点与复杂性。中越边境具有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民族特点，其丰厚的人文环境特别适宜作为本课题的考察地区（有关中越边境地区的特点将在下节详细论述）。

我们课题组在中越边境，主要在桂越（广西）地段共设了6个子项目，即6个考察实验点（见文末附图：本项福特基金项目典型考察点分布图）。

在边境广西一侧按不同发展程度和文化特点设立4个考察村点：那坡县百省乡水弄村苗族（民族教育）点；靖西县旧州街壮族（工艺文化）点；凭祥市友谊边村壮族（农商文化）点；东兴市江平镇万尾村京族（海洋民族与旅游文化）点。在边境越南一侧主要作为综合对比研究点，共设两个村点：高平省广渊县福莲乡安依族村点；谅山省文朗县清新乡依族岱族村点。

我们采用跟踪田野调查和参与性实验开发的方法，分6个子项目组分头深入6个村点。作者全程参加了京族点和旧州点的调研开发，并多次下凭祥点和水弄点作调研考察，还到越南点的新清乡作了考察，并多次与越南学者进行学术交流，交换对设在越南的两个子项目的课题进展的意见。应该说，作者对课题所设村点的情况，特别是中越边境中方广西一侧各点的情况是比较了解的。全体课题组成员都能深入实地作调研，或参与文化资源开发试验。比如京族点子项目组主要成员3人，两年里下乡约450个工作日，可见课题组的工作是比较艰苦深入的。

我们所设的这些村点，有的经济取得巨大发展，是致富文明小康村，文化变迁激烈；而有的则几乎是赤贫民族村，文化资源开发困难，但也培育了不少亮点……不同发展类型的民族村点，所需要的“文化振兴”内容要求也不同，激烈的经济文化碰撞，给了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

本课题不同于以往课题的最大特点，是课题组成员深入村民中进行调研，并亲自参与、发动村民，就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开发，动手开展一些开发试验活动，取得不等的效益，从而大大丰富了我们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并不同程度地为改变所在典型村点的发展面貌，作出了积极的探索。

篇幅所限，本文以京族考察点作为论述的重点，其他5个考察点只能兼顾简略论述。

2 中越边境的历史文化特点与民族特点

我们选定中越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作为研究对象，是基于中越边境地区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和极具挑战性的现代化进程的需求，无论从过去到现在，在该地区生活的处于不同发展类型的跨境民族，都极具典型代表性、开发的紧迫性和潜能。

2.1 地理区位与民族构成

中国与越南的陆地边境线 1400 多公里,其中广西与越南陆地边境线占中越陆地边境线长的 75.7%。广西的那坡、靖西、大新、龙州、凭祥、宁明、防城港市的防城区和东兴市等 8 个县(市、区),分别与越南的河江、高平、谅山、广宁等 4 省 18 个县接壤,防城港市、钦州市和北海市还与越南隔海相望,海岸线 1500 多公里。广西边境一线 32 个乡镇、212 个村公所和 2800 多个自然屯。桂越边境地处亚热带,降雨量充沛,全年无霜期在 300 天以上,夏长冬短,对农作物或海产品生长具有良好的气候条件。除北部湾、北仑河河口和沿江河谷地势较平坦之外,大部分边境地区以山地为主,耕地相对缺乏。该地区相对于我国其它一些边境地区来说,交通比较便捷,是中国和东北亚通往印支三国和东南亚的陆路“大通道”,与越南的紧密地缘关系,成为广西边境发展边贸得天独厚的突出区位优势。

中越边境中方一侧居住着壮、汉、傣、布依、苗、瑶、京等 12 个民族。广西边境县市人口 232 万多人(1997),仅壮族就占 77.6%,少数民族人口占广西边境县市人口将近 80%。按越南确认的民族来计算,中越之间的跨国民族越南有 26 个,这些跨国民族,历史上大都是同源民族分布在国境的两侧,至今仍然语言相通,习俗相近,联系密切。

2.2 中越两国有着悠久而密切的历史文化关系

公元前 214 年,秦始皇平定岭南,并在该地区设置了南海、桂林、象三郡,现在越南的北部、中部地区,属于象郡。自此以后,越南的北部和中部就正式归入中国版图。公元 968 年之前,越南受中国直接管辖,越南纳入中国版图一千多年。公元 968 年,越南摆脱了中国的统治,建立了自主的封建国家,成为中国的“藩属”。直到 1885 年,中国清朝与法国签定《天津条约》、《中法会订越南条约》,承认越南是法国的“保护国”,才结束了中国与越南的“藩属”关系。中越两国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互相一直有密切而深刻的经济文化交流,汉语汉字、中国的儒家学说、政治、科技、乃至风俗习惯,对越南的影响都非常明显,中国也从越南的经济文化中吸收了不少优秀的成份。在中国的宋、元、明、清时期,中越两国间发生较大的战争有 7 次。但中越两国关系一千多年时间,总的说,战争的时间很短,中越关系在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间里,两国人民是友好交往、和平共处的。在近代,越南多次反抗外国侵略势力的斗争中,中国人民积极支持越南人民。两国边民患难与共,同御外侮,集中体现了中越人民的友谊,如越南抗美战争,当时越南群众每天都有数百人,最多时达 3000 多人,进入凭祥边境村寨及友谊关避难。战乱时期,两国边民都期盼和平。同时,桂越两侧的边民,多是跨境同源民族,很多人具有姻亲关系、兄弟关系。桂越 1020 公里的边界,很多不设防的地方都是靠两国边民的和睦关系来自觉维持。

尽管有时因种种原因,出现国家关系紧张,但两国边民的通婚、互通有无等民间交往仍一直不断。中越两国人民在长期的互助交流中结成了“同志加兄弟”的亲密关系。虽然 1979 年两国不幸发生了“对越自卫反击战”,但当战争的硝烟散去,两国又恢复了和平与密切的交往。即使战争的硝烟还没有完全散去,中越边境上的两国边民就已在悄悄进行着

民间贸易和往来了。两国人民这种悠久密切的历史文化关系，打下了共同心理基础。当然，作为国际边界，必然要对相关的时局政策做出反应，如，两国重大时局变化、区域性的东南亚金融风波、相邻国家间或本国内的缉毒、反走私事件等，都会对该边境地区产生影响。因此，这里又是一条对时局、周边地区和两国政策反应比较敏感的边界地带。

2.3 中越边境地区大都是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

广西的边境 8 个县市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于广西东南部来说，仍然相对滞后。1997 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GDP)，广西边境地区只有 3647 元 / 人，只及全国的 60%，广西的 84%。同年，广西的农民人均收入为 1875 元 / 人，全国为 2090 元 / 人，广西边境 8 县市的加权平均只有约 1740 元 / 人，贫困面高，历史包袱重，自然条件复杂，受边贸经济起伏影响大。越南一方的情况也基本相似，越北山区的民族经济长期以来滞后于越南南部、中部经济的发展。

自上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发展边贸之后，中越边境地区的民族社会经济文化有了重大发展，特别是近 10 年，两国都实行改革开放，并通过加强边境建设的一系列重大举措，中越边境地区两侧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并营造了边境地区各类不同发展程度的少数民族类型。但各地区发展不平衡，与本国发达地区比较仍有相当差距，帮助这条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继续脱贫致富仍然任重而道远。

2.4 多民族文化的结合部

按中国已确定的民族成分来计算，中越之间的跨国民族有 12 个，即壮、傣、布依、苗、瑶、汉、彝、哈尼、拉祜、仡佬、京、回等，另外有克木人和莽人；按越南已确定的民族来计算，中越之间的跨国民族有 26 个，即越 (京)、岱、侬、泰、山斋、热依、泐、布依、赫蒙 (苗)、瑶、巴天、接基、布标、哈尼、拉祜、普拉、侃侃、莽、贡、西拉、克木、仡佬、华 (汉)、艾、山由、占 (周 2002: 77)。虽然两国有不同的民族识别称谓，但边境中国一侧的民族基本上都可与边境越南一侧的同源民族对上关系。

桂越边境的边民历史上大都属于同一个古西瓯骆越族群，受同源的“根”的影响，这些跨国族群至今依然语言相通，习俗相近。但它们毕竟长期居住在两个不同的国家，受到不同的国家文化导向，所以这些同源的跨国民族文化必然分化为多元；而且这些跨国民族文化各自受到本国一侧邻近不同民族的经济文化影响，他们的语言、风俗又自然会有一个融合过程，而与边境另一侧的同源民族产生分化。所以中越边境地区就比较集中地出现了一个多民族的多元文化结局。这就为我们考察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及其发展走向提供了条件。

广西的 (中越) 边境地区，是一条以壮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地带。在广西这条带状的边境上，中国的少数民族壮族成了主体民族，壮族人口占该地区总人口的 77.6%，壮族遍布边境 8 县市，而且，由桂越边境自东南端的东兴到西北端的靖西，越往里，壮族的比例越高。除东兴、防城一带之外，其余的那坡、靖西、大新、龙州、凭祥、宁明等地，壮语 (“土话”)

在边民中的普及率很高，是主要交际语言。

中国的壮族，在越南是5个民族，即岱族、侬族、布标族、拉基族、山斋族。在与广西接壤的越南边境地区高平、谅山省，岱族、侬族等与壮族同源的民族分布也较多。壮、岱、侬族作为跨国民族和国内的少数民族，他们大致相同的民族传统文化，这对边境地区的发展是个重要因素。

“老、少、边、山”是中国用来形容大部分陆地边境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的代名词，对于广西边境来说，其特色还得加上“海”，“老、少、边、山、海”是广西边境特有的内涵。

“老”——这里历来拥有浓郁的革命传统文化。土地革命时期，龙州成为邓小平领导的龙州起义和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左江革命根据地的发祥地，那坡县也是当时左、右江游击活动区之一。当年宁明县边民发扬国际主义精神，为越南革命提供后勤保障的往事，也已成为佳话。这些革命文化传统，使边境民族的文化较内地其它地区呈现出更浓郁的革命气息。

“少”——边境县市大都聚居着壮族，同时杂居着瑶、苗、京等少数民族。

“边”——作为中国的南部边疆，这里历史上曾是数次战火的边缘，也是边境开放的前沿，更多的时候是边疆政治、防务主导当地一切事务，如今，沿边开放战略给这个地区注入了生机活力。集地缘、血缘、民族、国家情感为一体的边民意识主导着人们日常生活的观念与行为。

“山”——山地面积占了该地区的大部分，自给自足的农业文化和封闭的观念意识较浓。广西边境8县（市、区）散布着2800多个百来人左右的自然屯。凭祥市650平方公里之中，山地就占60%以上。

“海”——从地理上看，防城港市、钦州市和北海市与越南隔海相望，拥有1500多公里的海岸线，京族沿海又沿边的优势，在中国少数民族之中是不多的。京族是崇拜海神的民族，海洋文化的影响深刻，具有较强的开放意识。

桂越边境越南一侧也大致具有以上类似特点。可见中越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发展状况存在某些共性，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因此研究中越边境两侧的少数民族有可比性，而且民族传统文化能够在这一地区发挥深刻的影响。

2.5 中越边境地区是中国通向东南亚国家的重要通道，也是中国与东盟经济市场的结合部

东南亚地区是古老的中华文化与印度文化交流的地区，东南亚国家分别受到这两种文化的不同影响。越南则属于受中华文化影响深刻的国家，有学者将越南划入“中华文化圈”内。中越两国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使中越边境不仅是中越两国政治经济的结合部，并成为中国通向东南亚国家的通道和桥梁。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与东盟各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并积极开展各层面的合作。2001年11月中国—东盟10+1会议，一致同意在10年内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广西由于区位优势而在这一战略决策中占有重要地位，更突

显中越经济合作之必要和中越边境作为中国与东盟经济市场结合部的重要性。

以上可见,由于中越边境的区位特点和多层面的特点,为我们考察研究少数民族文化与经济的互动提供了深广的背景和难得的条件。

边境少数民族为适应环境、谋求发展创造了丰富的民族文化。这些民族文化资源如何开发利用来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是现代化进程中边境地区最富挑战的问题。因此民族文化如何振兴并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便作为中越边境民族地区发展紧迫的问题提了出来。

经济发展必定要从一个地区的内部去寻找增长力量的源泉。这里传统文化资源丰富,可开发潜力很大;把文化调适、发展作为经济扶贫的一个治本办法,这有利于双方边境地区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有利于边境民族在振兴经济的进程中少走弯路。

3 京族的经济发展与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

万尾京族考察点是本课题所设的6个考察点中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一个,代表的是经济快速发展的边境少数民族类型。京族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随着改革开放、边贸兴起带动各业,经济迅速发展,到21世纪之交,其经济发展水平已属于55个少数民族之前列。京族地区由贫困落后的海岛边村,一跃成为全国少数民族富裕的“第一族”,可谓十年巨变!随着经济的大发展,京族的传统文化也发生极大变化,为我们考察民族传统文化与经济的互动关系提供了难得的典型。作者自上世纪70年代下半期起,曾十数次到京岛考察,亲眼目睹见证了京族地区的“传统”与变迁。

3.1 京族丰富的民族文化与传统社会

我国京族与越南的主体民族越族是跨境而居的同源民族,习俗相近,语言相通。据清朝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万尾岛京族订立的乡约中说“承先祖父洪顺三年贯在涂山,漂流到此——立居乡邑,壹社贰村,各有亭祠”。“洪顺三年”是越南后黎封建王朝的年号,即公元1511年,正是中国明朝武宗正德六年。由此可见,万尾岛的京族是十六世纪开始,陆续从越南涂山(今海防市附近)等地迁来的,已有近五百年的历史。

目前,我国京族人口约1.9万人,大部分聚居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所辖东兴市江平镇的万尾、巫头、山心三个岛上,与越南隔海相望,素称“京族三岛”。经围海造田,如今三岛都已与陆地相连成为半岛,但人们仍习惯称为“京族三岛”。京族其余少数人口杂散居住在周边江平镇上以及所属的潭吉、竹山、红坎、恒望、米漏一带村子。

解放前,京族三岛是孤岛,四面环水,退潮时才能与大陆往来,交通不便且水多田少,产量低,粮食不够吃,主要靠手摇竹排出海打鱼为生。由于交通不发达,捕捞到的海产品只能低价出售或根本卖不出去,常常是拿到附近的江平镇交换些油、盐或拿到山区交换些红薯、芋头、木薯、玉米,以解决粮食困难。大多数京族人极贫,缺衣少粮住茅屋,当时被称为“安南人”,受歧视。

京族三岛地处祖国大陆海岸线的最西南端,面对浩瀚的北部湾,背倚十万大山,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仅一水之隔。其中万尾岛与越南近在咫尺,万尾岛,是由海水冲积而成的沙岛,京族三岛总面积 20.8 平方公里其中万尾岛面积最大,面积为 13.7 平方公里。

万尾村,是聚居京族人口最多的一个行政村,下设三个自然村(万东、万尾、万西),23 个村民小组。人口主要是京族,还有壮、汉、瑶等民族。据 2003 年 5 月万尾村委的统计,全村共 1002 户,4042 人,其中京族 2875 人,约占 71%。

京族曾长期处在传统社会之中,其民族文化内涵深刻,丰富多彩,至今虽有较大变化,但仍保留着若干内在的、比较鲜明的民族传统文化特点和深刻影响。略举数端如下:

(1) 翁村制度。“翁村”,原指实为京族村庄的自然领袖。翁村制度是京族特有的社会组织形式,是原始社会长老制度的遗存。由群众选举产生,每届有一定任期,主要职责是监督执行村规民约,处理族内纠纷,主持“唱哈”祭祀仪式,筹办修桥铺路等事项。遇有族内大事,需与族中长老商议决定。翁村是京族处理族内大事的民间权威组织。解放后直到现在,京族村子的村长是由群众选举经政府任命认可的,村长也关心和协助处理京族内部的一些民族性事务,但在京族民族事务中,另有多层面的民间管理组织,如各姓氏有各姓族长负责组织各姓氏的诸如祭祖、节庆等活动;全村性的民族事务,则另有专门的“委员会”负责管理,这是由全村村民选举产生的用来管理哈亭,每年组织过哈节的专门组织。该“委员会”的成员,即民众习惯称呼的“哈亭老大”,都是由京族中能干、负责、公道、有群众威信的人担任,除了管理哈亭、组织过哈节,京族中的重要民俗事务,如全村的祭祖,重大的喜庆婚丧活动,他们都积极组织参与。政府任命的村长,也都支持这些京族社会组织的“委员”。“老大”、族长,组织京族内部带民族性的事务活动,形成了京族内部另有一套管理民族事务的一班人。

(2) 京族原有很严格的一套乡规民约,对应该做什么、不允许做什么都有一系列严格的明文规定,如有违反,要受到族内严厉的处罚,可处以罚金、开除出族,严重的甚至可以处死。现在虽然有些村子已没有乡规民约的明文规定,但这些乡规民约的权力“余威”和传统影响仍在,它所形成的一些伦理道德规范仍对现代人有引导约束的作用,如不忘祖宗、孝顺、尊老爱幼、诚信、勤劳、互助等仍是京族人的传统美德。

(3) 京族原有“寄赖”等原始共产的遗俗。过去京族人民采取“塞网”的捕鱼方式,即打桩布网在滩涂上,海潮退时,鱼虾蟹就会随潮水下退被围在网中,退潮后塞网的网主就派人去捕捉被网的鱼虾蟹。不参加塞网的人,也可在网主捕捞过后,来捕捉那些余下的鱼虾蟹,称之“寄赖”。“寄”京语是“见者有份”,“赖”意思是“沾光”,反映了京族人“有福同享”的风尚。虽然京族现在生产作业方式已有很大改变,但“有福同享”的习俗,在现代经济中仍有重要影响,如拉网捕鱼,收鱼时在场参与者仍可获得一份馈赠;京族人很重视内部的团结互助,在经济活动中注意诚信和利益共享,乐意帮助困难者,因而家庭关系、邻里关系、人际关系都比较和睦。

(4) 唱哈等重大民族节日和传统的宗教活动仍对京族人有很重要影响。京族有丰富多

彩的民歌、民间神话故事、音乐舞蹈等民间文化艺术形式，哈节可以说是京族民族民间文化习俗的大展示。哈亭文化算得上是京族传统民间文化的核心。京族的哈节，由哈亭老人们组成的管理“委员会”，对每年过哈节的准备活动组织十分严密，一百几十人谁做什么都张榜公布，几天的盛大活动井然有序。很多远在外地工作、经商的京族人都赶回来过节。哈节“唱哈”往往狂欢数日，还有一系列敬神、祭祖的盛大活动。哈节解放后虽然有一段时间受极左思想的影响被禁止，但改革开放后，哈节恢复，京族人民的民族感情被激活。传统又复苏延续。京族的宗教是佛、道、师合一的一种信仰，这些宗教信仰至今对京族人仍有重要影响。表现在“师傅”与“降生童”信仰上。

京族三岛从事民间传统仪式的“师傅”（师公）约有10多人，这些人基本上都不脱离日常生产。做这一行有专门拜师学艺的，也有父传子、子传孙的。师公要5-8人才成帮，一般是8个人合起来共做仪式，主要是做斋事、超度亡灵，也有单独给人结婚、起新房择吉日、看风水的。阮继儒、苏维坤、苏维绍、阮兴富等老人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降生童是另一类的传统仪式人员，类似巫公。他们的“业务”范围与师傅有所不同，不参与做斋事，主要是给人看日子、卜凶吉、解难等。他们身份的获取一般带有一些神秘性，如有的生一场病后，认为有神降附于其身体，就成了降生童。杜玉彬老人就是这样成为降生童，并得到认可的。

这些主持传统仪式者，都是兼职的，他们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人们有斋事需要他们帮助超度死者亡灵，或有灾难事时，需要他们做沟通人与神鬼之间的桥梁。这些仪式活动反映了京族部分群众仍比较浓厚的信仰心理。

此外，民歌、歌圩等民族传统活动，对京族中老年人仍有极大吸引力，至今，万尾村仍保持每10天一次的歌圩（每月的10、20、30日为歌圩日），每逢歌圩日，中老年人便早早自发来到歌圩场（是村里在海滩边搭建的一座简易屋），兴致勃勃地对歌，如痴如醉，留连忘返。歌圩场的屋子里，数十人挤了满满一屋。还有热心人自己掏钱几十年一直不间断地收集整理京族民歌。

可以看出，京族的传统文化极其丰富，对京族社会影响是十分深刻的，即使在现代经济发展的情况下，这些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意识，对中年以上的京族人仍有深刻影响。作者70年代到京族地区时，仍能见到京族的许多原始纯朴的民俗民风，和那些低矮的“栏搭屋”，以及群众并不宽裕的日常生活。

3.2 京族地区经济与文化的互动

得益于改革开放，京族地区受边贸的带动，以及边贸、捕捞渔业、海水养殖、海产品收购加工、旅游等各业的多元发展，京族人十多年巨变，摆脱了贫困，实现了富裕奔小康。到21世纪初年，京族的年人均收入已超过4000元，成为我国少数民族富裕的“第一族”。如今的万尾村已是一个“平顶楼”林立，交通便利，风光秀丽的现代化城镇和旅游度假区。

在京族地区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因素与文化因素的互动、是不可或缺的。京族

社会的发展，给我们提供了生动的实例：

(1) 在启动边贸龙头产业中，京族民族文化起了关键作用。由于种种原因，京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曾一度处于相对迟缓的状态。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加上边境战事行止，中国与邻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使京族地区得以乘改革的东风，捕捉一个个发展机遇，而京族首先抓住的是边贸开放的机遇。1989年春节桂越边境出现的边贸开放热潮，可以说揭开了京族近10多年经济大发展的序幕，而京族正是借助了自己的区位优势 and 民族传统文化优势，和与越南的主体民族“越族”语言相通，习俗文化相近，地域毗邻，以及京族人的热情勤劳、诚信等传统品德，使越南商人喜欢与京族人做生意。因而在边贸的竞争中，京族人夺得了优势并一直维持下来。1989年的边贸热使许多京族人投身其中，并成长了大批生意人和边贸经纪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许多京族妇女成了女经纪人，因为京族女性特有的温和、善良、细心、耐心和更为诚信、更富有亲情，做边贸生意的商人更愿意找他们充当经纪人、中介人。于是，很多“做边贸”的京族人都富了起来，边贸的勃发又带动了京族各业的兴旺。这其中，京族民族文化的作用是功不可没的。

(2) 民族文化资源开发为文化旅游资源，是京岛经济发展中具有战略意义的又一步。发展旅游业，使京族的民族民间文化与人文环境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发展，哈亭、海滩拓展成为旅游文化景点，京族的民族传统文化成为旅游资源开发中的亮点。哈亭是集京族神庙、宗祠、节日音乐、歌谣观赏厅、餐厅和平时村社议事堂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亭庙式建筑物，“唱哈”民族特色浓厚，现已成为京族发展民俗旅游的重要人文景观。

(3) 京族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仅基本上实现了全民族的脱贫致富奔小康，而且大大丰富了民族文化内涵。如经贸推动京族地区从业的多元化发展。过去，京族人只是简单地从事自然出海捕捞，伴以少量的粗放耕种。现在发展成为边境贸易、旅游服务、捕捞、浅海滩涂养殖，海产品收购、加工等多种从业取向。多元经济的带动，使京族村庄逐步向现代化城镇发展。京族由原来的孤岛、茅屋、木屋形成的村落，现在已完全改观。如今三岛已全部与陆地相连，有宽阔的海堤公路大道与陆地相通。茅屋、木屋已基本被钢筋水泥结构的平顶楼取代，漂亮的楼房与绿树相辉映。京族人的物质文化已随之改变，生活习俗也有了很大变化。

(4) 经济发展促进了民族平等、男女平等。以前京族和汉族通婚的很少，因为京族贫穷。过去汉族就有山歌唱道：“千其千，有女不嫁安南千”（意思是有女千万不要嫁京族人）。现在，不但当地的外族女想嫁到京族地区当媳妇，而且一些到京族地区打工的外地女也很乐意嫁过来。不少京族姑娘还招来不少上门郎。很多姑娘嫁出去后，又把丈夫带回京岛来谋生。经济发展大大提高了京族人的社会地位，现在京族人与汉族人及外地人的交往已消除了民族不平等现象。

解放前妇女受歧视，改革开放使妇女进一步走出社会，在很多行业如边贸、种养、海产品收购加工、旅游业等，妇女成为主力军，出现了大批女能人。京族家庭现在大多数由妇女理财、管家。妇女地位大大提高。

(5) 传统的习俗增加了新的内涵。如京族地区过去流行父母包办婚姻, 现已普遍实行婚恋自由, 甚至对先同居后结婚比较宽容。京族人的消费观念, 过去以建房、结婚费用居一二位, 现在除了建房, 扩大再生产的投资已居于第二位。随着经济的发展, 京族人注重家庭的观念继续保持发扬, 但生育观念发生了变化。京族人勤奋努力, 全力投入发展生产致富, 因此也不愿意多生孩子, 过去“多子多福”的思想有了改变。妇女的能干和妇女地位的提高, 也使人们不再重男轻女, 现在计划生育措施在京族地区已被普遍接受。

3.3 经济发展与京族传统文化的淡化流失

京族地区经济大发展给京族社会带来了勃勃生机, 但也对传统文化带来极大冲击, 使传统文化日渐淡化、流失。略举例如下:

(1) 京族民歌、歌圩。

京族民歌已经由盛转衰, 中青年一代已经失去歌唱本民族传统民歌的兴趣。京族民歌在解放前、解放初期曾经十分盛行, 男女老少, 几乎人人能出口成歌, 内容涉及渔事生产、爱情、社会民俗生活各方面。京族民歌的调子约有 30 多种, 有的慷慨激昂, 有的凄切委婉, 具有十分浓郁的民族特色。《宋珍与陈菊花》是其中的典范, 该长诗有手抄本, 主要以口头传唱流传于京族民间。但目前在京族地区已经找不到一位能够完整颂唱《宋珍与陈菊花》的歌手。《过桥风吹》曾是一支家喻户晓的京族经典爱情名歌, 曲目不长, 曲调优美, 通俗幽默, 利于传唱, 但现在在懂京语的青年当中, 能够完整唱此曲的人也已十分少见。

京族歌圩至今在万尾村依然保存, 歌圩日一般都会有五六十人参加, 以老人居多, 当今京族青年所喜爱的是汉语流行歌曲, 电视、广播、录音机、VCD、CD 等音乐传播载体, 被大量流行歌曲所充斥。京族青年们没有兴趣, 也少有机会接触本民族的传统民歌。所以, 京族歌圩中极少有青年人参加。

(2) 京族舞蹈。

京族舞蹈以传统祭祀娱神舞蹈为主, 多在哈节时才表演。一般由 3-4 人一起跳, 在万尾村、山心村的哈节, 几年来都只有阮成珍、黄玉英等四个年纪较大的“哈妹”在跳。舞蹈类型有花灯舞、花棍舞、花舞等。传统舞蹈也面临继承乏人的问题, 至今很难找到愿意来学习的中青年人。年青人更喜欢卡拉 OK、迪斯科等现代劲舞。

(3) 独弦琴。

独弦琴是当前京族传统艺术当中的瑰宝, 其最大特色是只由一根弦和一根摇杆、半个葫芦、半块竹片构成, 其音悠扬, 独具风韵。独弦琴是京族目前保留的最有特色的一种传统民族乐器, 在民族音乐界颇有名气。然而目前能够熟练演奏独弦琴的京族人只有 2 人, 再不保护抢救, 独弦琴将在京族成为“绝响”。

(4) 喃字。

喃字是京族人民借助汉字创造的表达京族的文字, 用来记录京族历史文化的工具。它是采用汉字的构字方法, 主要借汉字表音表义而创造出来。从 12 世纪开始创造使用。在

京族地区民间的歌本、经书、族谱、乡约等，除了使用汉字，也间杂使用一些专用于表达京语音义的“喃字”。据统计，目前在京族地区能够认识和使用喃字的人已不足8人，而且均为60岁以上者，以民间仪式“师傅”为主。

(5) 哈节与哈亭。

“哈节”是京族最隆重热闹、最富有特色的民族传统节日。哈节活动最能集中展示京族传统文化全貌，是京族人民长期从事海洋渔业生产的文化积淀，哈亭则是京族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除哈节一整套祭神娱神传统仪式外，独弦琴、京族歌舞、神话传说、英雄故事、民族服饰、民族小吃等传统文化都在哈亭里聚集，哈亭哈节使京族传统文化闻名遐尔，充满魅力。但年轻一代觉得缺乏新意，参与热情已日渐降低，目前哈节已面临对京族青年人吸引力变弱的趋势；如今虽然有各级政府部门的支持，有各级媒体每年不同程度的宣传报道，但由于对哈亭哈节缺乏深度研究和保护创新的措施，至今哈亭与哈节还远远不能对外界充分昭示其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导致对青年人魅力与影响下降。

(6) 民族文化教育传承面临断层。

过去京族社会处在封闭的传统之中，人们一代代靠口耳相传、言授身教，使传统文化传承下来。如今改革开放，使京族处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之中，各种文化在这里登陆，京族遇到了各种外来文化的包围，青年人很容易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小孩子们在学校里接受的是“正规教育”，基本上脱离了有关当地民族传统文化方面的教育，大人们整日忙于各种经济活动，也无暇顾及孩子们的传统文化知识的耳提面授。不同民族的通婚，对外交往通用汉语（粤语方言）交流，导致部分家庭成员和部分青少年多用粤语交流，不会说京语，逐渐远离京族传统文化，民歌不会唱，独弦琴不会弹，字喃不识，对京族歌舞、过哈节等缺乏兴趣，对京族的历史文化一窍不通。长此下去，京族就可能失去自己的文化身份了。所以，对于面临流失的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是必须努力抢救保护的。

3.4 保护开发京族民族文化资源的试验

(1) 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教训。

两年多时间，课题组成员在下乡450多个工作日的日日夜夜，始终坚持经常与村委干部和村民商量，听取他们的意见，我们的活动计划必先征得村委同意支持，有的活动是与村委干部一起来做的。我们认真听取村民的意见，先后做了数十户的典型户调查，并从京族人中的老、中、青、妇、干（部）各类精英、哈亭老大、民间文化专长者、民间宗教仪式者、各生产专业户等各方代表人物中，采访了一百数十人，课题组成员有一段时间还入住村民家，以便与村民有更多的接触和深入了解的机会。

在我们调查民族文化资源、思考保护开发试验的过程中，有两件事给了我们警醒和启示。

其一是1996-97年，东兴市政府出资数十万，由东兴市文化局牵头，万尾村配合，在万尾沙滩区建起了带民族色彩的竹楼、舞台、演出厅，从各地招聘了数十人的演员队伍，将他们组织起来排练京族歌舞节目，由政府（开发办）按月发工资，每日按时组织他们演

出，每次演出一个多小时，本以为这样一来可以促进金滩旅游业的兴旺发展。由于这些演员来自四面八方，大多数不是本地人，非京族，只有数名当地的京族青年参加。所以这些演员缺乏对京族的文化认同和弘扬民族文化的积极性，只是为工资干活而来，因而在打造当地的深厚文化氛围方面根基不足。加之在节目的演出质量、演出方法及组织游人方面都有不足和缺乏配套措施，因而效果不大，游人仍比较少。政府无力长期支付这笔不小的开支，此事前后大约经历一年，演出队伍即告解散，舞台等演出设施或卖掉或出租。这次组织京族传统节日演出的吸引游客的尝试即告失败。据说这批演员中的不少人，后来跑到越南去搞演出赚钱去了。

另一个事例是2001-02年，上级有关旅游部门，出于开辟京族文化特色旅游项目的好意，在江平镇的坛吉村组织京族渔村游活动，动员村民腾出房间举办渔村旅舍供游人住，为了营造京族文化氛围，政府还出钱在坛吉村的中央建了一个京族文化广场，还建了一座类似哈亭的建筑，希望组织京族文化活动，促旅游发展。但由于坛吉村虽有不少人报为京族，但缺乏京族传统文化色彩，他们不讲京语，擅长以煤的运输贸易为主业，不过哈节，自然也没有京族传统的对哈亭内各类神的崇拜祭祀习惯，因而他们对京族文化广场希望营造的京族传统文化色彩不予认可，他们也不愿意在哈亭内放入各类神灵。而京族三岛上的京族人，对于在坛吉村建立一个京族文化广场也有意见，认为坛吉村不具备京族传统文化代表性。后来，坛吉村京族渔村游的旅游项目据说也没有成功，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

可见，保护开发民族文化资源，光有好心还不行。对可开发的民族文化资源，必须因地制宜地选择开发方向，不能流于老套。保护与开发，必须实事求是，真正把握京族文化精华，坚持创新原则，依靠当地京族人进行保护开发，并让当地人得大利，这是保护开发民族文化资源的根本。离开这个根本，必然失策、失败。

(2) 成立“京族文化开发中心”

受到建立文化产业思想的启发，经过将近一年的筹划准备，课题组与村干部、村民代表及防城港市、东兴市相关政府部门领导商议，决定先成立一个非营利性的京族文化开发中心，进行京族文化的收集、整理、保护、宣传、开发，等到条件具备后，再在此基础上注册成立有经营资格的文化开发经济实体。为此，2002年11月26日，在课题组的积极组织推动下，终于在万尾村挂牌成立了“东兴市京族文化开发中心”。该中心由东兴市民族局局长、万尾村支书和小龙庄京族老板孙进、哈亭老人及有关村民代表等人组成了领导小组，由课题成员担任中心顾问。

京族文化开发中心成立的意义，是为今后京族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工作提供了组织机构和制定一个近期和远期的奋斗目标，为民间、政府、学者等多方面人士对京族文化的保护开发提供了一个宽阔的合作平台。目前，京族文化开发中心正在努力筹划和实施有关民族文化开发方案。相信“京族文化开发中心”将大有可为。当条件成熟时，可望转为一个可独立运行的经济实体，实现经济效益的良性互动。

(3) 抢救京族喃字、独弦琴资源，建立京族文化展厅

抢救字喃资源的活动，一是组织京族古籍整理与出版；二是组织字喃培训班。这两项活动均由退休老干部、京族懂字喃的文化土专家苏维工领头，并纳入“京族文化开发中心”工作计划。

在苏维芳原来整理成果的基础上，课题组动员所有识字喃、有名气的京族三岛上从事传统仪式的老师傅及故事能手、民歌能手共同参与，收集到一批宝贵的第一手字喃文献资料。此京族古籍丛书的整理目前已接近完成，并决定交由广西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帮助出版。

2003年7月，克服种种困难，第一期京族字喃培训班终于开班，由苏维芳作主讲老师，第一期学员有10名京族村民参加，因陋就简，就在小龙庄和村委办公楼等地开堂讲课，每周定时学习两次，目前已讲学10余次，讲者、学者都十分认真，学员们都决心为传承京族的传统文化尽力。

独弦琴的培训已列入计划，主要由于培训班的经费一时无法解决等原因，学习班至今尚未能启动。经过努力，防城港市民委已答应支持一定的课题经费。经费到位后可望启动培训计划。

在村里建立一个京族文化展厅是许多京族干部群众及专家学者长期以来的愿望。京族因其地位的特殊性和明显的海洋性民族特征，以及现代生产生活的急剧城镇化、现代化，非常值得将其过去及部分现在仍然保留使用的生产生活用具集中起来向京族人及外来者进行展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保护和开发京族民族文化资源的措施。但是这个文化展厅迟迟没有能够建立起来，关键是缺乏经费。

课题组认为，应当在现有条件的基础上，发动群众自己起来建立一个文化展厅，先开个头，自力更生干起来，以后再逐步充实提高。经过课题组与村委、村民的协商，京族干部群众终于决定自己动手，不再仅是指望上级的资助。2002年11月—12月期间，由万尾村党支部苏明芳、小龙庄京族老板孙进等人带头，深入民间、走村串户，以捐助或借用的方式收集到渔具、服装等各类物件20多件。课题组也赠送了字喃本、独弦琴及相关照片资料，小龙庄为展示厅提供了场地，京族文化展示厅终于在2002年12月底初步建成并对外开放。后经孙进等人数月努力，京族文化展厅又增加了数十件展品，展出面积也扩大了，孙进把小龙庄的一个船形餐厅都用于展览。

这一展示厅规模和相关设备虽然还远远不够，但是它集中反映了民、商、官、学各方保护和发扬京族传统文化的努力。现在，各方仍然在策划如何把文化展厅进一步扩充办好。相信这一由京族人民自己动手、白手起家，建立在京族居住村内的民族文化展厅将逐渐充实完善。

(4) 编写京族乡土教材，振兴民族教育

由于学校的“正规教育”，缺乏结合当地的民族知识的教育内容，导致京族青少年一代，对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知之甚少。这也是京族传统文化日渐衰退、面临传承断层的重要原因。2001年下半年，课题组联络了京族中学和万尾、山心、巫头三所京族地区小学的老师共同

商议，达成共识，由五位小学老师和课题组成员 2 人组成了“京族乡土教材编写组”，经过大半年的艰苦努力，初步完成了《京族乡土教材》（试用本）的编写，经过京族各方代表人士审阅提意见，于 2002 年暑假定稿印刷，决定由万尾、山心两个小学以课外活动课的方式作试点试讲。课题组还为上课的老师提供了备课资料，制作了电脑课件、图片、VCD 等动态教辅材料，供老师教学使用。据了解，《京族乡土教材》试讲后，学生和家都反映好。山心小学用一个五年级班级教学试点，用一个学期全部讲完《京族乡土教材》，我们对这个班的讲课情况进行了问卷调查，该班 42 人，全部是京族学生，男 26 人，女 16 人，其中会讲京族话的 35 人，不会讲的 7 人。在回答“你喜欢《京族乡土教材》吗”的提问时，回答喜欢和比较欢喜的 38 人，占回答人数 97%，在回答“你的父母对你学习《京族乡土教材》的态度”时，回答支持的 41 人，无所谓的 1 人，不太支持的 0 人，反对 0 人；在回答“你学习了《京族乡土教材》有什么收获”时，回答对京族更了解的 8 人，加深对京族热爱 17 人，认为保护京族文化重要的 17 人，回答没有大的收获的 1 人，没有收获的 0 人。可见对《京族乡土教材》的教学反映是肯定的。

（5）将京族传统文化活动整合，形成京族文化旅游路线进行试运行

京族三岛万尾村 1996 年被批准为自治区级风景名胜区，为了将京族丰富的文化资源转化为旅游优势，课题组与村委干部深入村民做组织发动工作，把万尾村里的年青人组织起来，请东兴市文化局文艺辅导队老师带动排练京族文艺节目，并以老带新，请村里老哈妹教年青人唱哈歌，并把一些渔事生产活动开发为旅游活动，这样就整合出了一系列带有京族文化风情乡土特色的旅游节目，并设计了一份以京族三岛为旅游目的地的旅游线路，2002 年 5 月 2-3 日是双休日，我们按“两天一晚游”模式试组织了 28 名南宁市的游客到京族三岛进行民族文化旅游观光。旅游结束后，对每个游客都进行了问卷调查，大部分游客对本次旅游都表示满意，认为能从中体会到一些京族风情。这些试验活动，为如何将京族一部分文化资源开发出来与旅游业相结合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相信以上这些试验活动，对今后京族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仍有重要作用。希望不久，课题组曾期盼的由“京族文化开发中心”发展成为进行文化资源开发的村级经济实体的过渡能成为事实，并取得经济效益，实现文化资源的开发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以上只是列举了课题组在京岛万尾村所做的保护开发京族民族文化资源的几项试验活动。这些活动很有意义，也很重要，但要完全真正彻底地解决好京族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解决一些根本问题，如，发展教育，提高全民科技文化素质的问题；京岛地区自然环境的保护问题，目前京岛的海洋资源和生态环境所面临的问题仍十分严峻；还有需要防止和治理随着经济发展而引发的黄、赌、毒、走私、道德滑坡等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必须在政府主导下动员全社会力量加以综合治理解决，而且必须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才有望实现。

4 其他考察点综述

4.1 凭祥边村壮族农商文化开发研究

凭祥市友谊边村壮族考察点是本课题所设的6个考察点中,经济发展属中等上下水平,但却有着特殊经济文化结构特点的边区农商文化类型。在整个中越边界两侧,遍布这类农商文化类型的少数民族。

4.1.1 边村与农商文化

子项目选择友谊关附近两个以壮族为主体的村子为考察点,称为友谊边村。友谊村共429户,其中342户是农业户,87户非为农户,总人口1737人。壮族占总人口的80%以上,其余主要为汉族。壮族是当地的土著居民,为古代骆越人的后裔;汉族居民大都居住在隘口街上,他们是从外地迁入的。

在特殊的地理、社会历史环境中,中越边境农村的经济生活虽仍以农为主,但边境贸易也是居民经济生活的一部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不同于一般内地农村的民间文化,该子项目学者将之称为农商文化类型。

所谓农商文化类型,是指广西边境地区少数民族农村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特有的传统文化,它具有如下特征:(1)以农为主、农商结合、重农但不轻商;(2)小农小商的结合,既互相包容促进,又互相制约;(3)鲜明的商品意识和价格文化心理;(4)波动性、脆弱性。

边村地处中越边境,紧靠著名的友谊关。这里是中国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边民参与边境贸易活动历史悠久。自清朝初期起,这里就已成为中越边境重要的商品集散地。特别是清光绪年间,在隘口形成了边境贸易市场,中越边民和内地商贩集中在隘口街做买卖,1953年中国政府决定开放隘口为对越小额贸易口岸,1958年中断了公开的贸易。1959年,中国出现暂时经济困难,边民通过边境的一些小路越境进行私下交易,这种交易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完全终止。从1984年开始,在边境线就有边民自发性小规模互市,后来参与的人越来越多。1992年以后,群众原来自发性参与的边境贸易逐步形成有组织、成规模的活动,边村附近的隘口形成了以布匹生意为主的布匹市场,边境贸易做得红红火火。

4.1.2 农商文化的成因

近代以来,在中越边境农村,农业和边境贸易结合的生产方式所培植形成的“农商文化”,既具有农业文化的一些特点,也具有商业文化的一些特点。村民视土地为命根子。现在,村民仍然在祖祖辈辈耕种的土地上从事种植业来获取基本的生活资料,与土地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边村总体情况是人多地少,人均水田不足1亩;户均旱地不足0.5亩。所以,村民都格外珍惜土地资源。在全民参与边贸的岁月里,村民为了经商又不误农时,有的白天种田,夜间到边贸点做生意。这里的居民都极少流动。即使在特殊时期迁徙的居民,他

们也始终牵肠挂肚的惦记着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及他们亲手种植的谷物和林木。一旦情况好转，人们又回到故土。边村与内地农村不同的地方，就是人们重农但并不轻商。长期以来，边贸活动已成为两国边民经济生活的一部分。

在壮族占多数的边境地区友谊村，价格观念却深入人心，妇孺皆知。这与其他地区传统壮族有不小区别。无处不在的价格文化是边境边民商贸文化的典型表现。价格文化成了边民的一种交易制度形成。随行就市、什么得价就做什么。当地居民的一些传统产品如八角、烧酒、豆腐、长期以来就是以交换为目的生产的。劳动者由获利的大小来决定自己的生产计划。特殊的地缘形成的“差价”观念，使友谊人以“重商”出名。

中越边境农商文化的形成，一是由于边境的自然环境和生存的需要所致。边境多山、大都交通不便，土地少，土壤瘠薄，农业收入有限，国境两侧的边民需要互通有无；二是长期历史形成的跨国民族文化的共性，促成了边民合作交流的条件；三是壮族性格的开放性和喜结交的文化积淀，在以壮族民系居多的中越边境地区，成就了农商文化的形成；四是中越两国边境政策的鼓励，也促进了边境农商文化的发展。1991年11月，中越实现关系正常化。政策松动，使得手提肩挑的边贸向小额批量贸易飞跃发展。凭祥相继出现了弄尧、浦寨等边贸热点，全市直接参与边贸经营的约有2600多户，占全市户数的11%，日均参与人数达1万多人次，凭祥的边贸占广西边贸的1/3强。友谊边村自然也卷入了这个商潮。

农商文化促进了中越边境社会的开放，较之耻于经商的少数民族封闭地区，中越边境的少数民族有了更适宜的环境，有了价格文化的理念与经验，也多了致富的路子。但是，由于这种农商文化类型，是以农为本，以商为辅，是小农小商的结合，它植根于农业社会，难免受小农经济和小农保守思想的制约。正如边村人虽然从商，但形象地自称是“泥腿子商人”，小商的“泥腿子”，略有风险就马上退回“泥”里。这也导致了这种农商文化的波动性和脆弱性，使边境地区的农业和商业发展容易大起大落。使他们在竞争中“不敢做大”，稍遇挫折，便退避甚至弃商归农。20世纪80年代边境贸易重新兴起的初期，村民人人经商，一派红火。但是，自90年代中期以后，边民一步一步退出了边境贸易活动。原因是边民习惯于“小商”，货一出手就能见钱，“吹糠见米”。但是后来到凭祥做生意的外地人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本地人的小额贸易越来越行不通。于是边民一步一步退出了边境贸易。而边村的八角市场竞争也日趋激烈，由于本地八角生产科技含量较低，加工技术不高，所以边民的“农”在竞争中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边贸的起伏又对边境地区的民族文化和社会稳定形成一阵阵冲击波。看来关键在于“文化”，影响了与经济的良性互动。

4.1.3 农商文化的功能

(1) 农商文化的正面功能：

一是农商文化类型有利于边境社会经济的稳定。边境各族人民除了发展经济以外，还肩负守卫国土的重任。以农为主、农商结合的经济模式与文化类型，使边境居民和土地结

合在一起，世代定居，从而起到了安定边疆、繁荣边疆、守边戍边的作用。

二是边村农商文化还促进了相邻的中越两国边民间的交往，促进两国的睦邻友好。两国边民通过小农小商经济模式与农商文化形成的民间纽带，降低了两国在边境的交往成本和国家的军事守卫成本。

三是边村农商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对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边民的脱贫致富有促进作用。同时，边村农商文化有利于以农振商、以商补农，推动大农大商的形成，进而起到兴边富边的作用。俗话说，“无农不稳、无商不活”。在这方面，友谊边村的村民说得上是以农振商、以商补农的专家，也富有创意和“闯劲”。

(2) 农商文化在发展中存在的冲突：

一是农商冲突。边境贸易的发展出现起起落落的情况，农业生产也存在起落情况。当边境贸易日渐红火，农民几乎全部从事边贸，过去被用于耕种的农机具也全部改装为运输工具上了边贸，农业大都恢复牛耕，有些水利工程建设也受影响。所以少数缺水的农田荒芜了，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未能像商贸现代化一样同步加快。

二是传统边贸与现代边贸的冲突。边民长期参与并适应的是肩挑手提的边境互市和小额贸易观念。但是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边境人流、物流激增，这一方面有利于弘扬边境的商业文化，同时，又使习惯于传统边境贸易的群众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困惑，许多人知难而退，在边贸初期建立的一些边贸点、营业铺纷纷关门，出现了一派萧条景象。

三是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比如，面对高等级公路的建成通车，大批人流、物流涌入当地边贸市场，逐步取代了手提肩扛的传统小额贸易；现代化的通讯方式，逐步取代民间传统的信息穿梭方式；大载重量的现代化运输工具，逐步取代了民间的扁担、手扶拖拉机的时候，村民的心里越来越不踏实，埋怨干嘛修这么好的公路。此外，边贸市场也带来了各种各样品味的文化，使本地年轻人对外来新的消费娱乐文化感到新鲜好奇，而对本民族传统的歌坡（歌圩）、庙会等不感兴趣。传统文化中美好的内涵有流失之虞。

总之，传统的小农小商型农商文化，对于边境的稳定与开放起着重要的作用，但也使得边村的社会经济长期停留在小农小商阶段，其中不时穿插着剧烈的边贸高潮与低谷的发展波动，但农业与商贸的发展却一直被困扰、上不了规模，有发展的潜力又未能实现向大农大商的转型。

4.1.4 农商文化的开发试验

基于以上对农商文化特征的认识，课题组认为，必须从振兴当地民族文化的角度，解决农商之间矛盾，关键是推动小农小商向大农大商转变。

课题组经过两年的艰苦工作，在边村大致做了如下几件事：

(1) 与乡镇官员结合，深入村民，开展调查研究与动员教育，进行价格意识与品牌文化的教育开发；打造八角、边贸服务、瓜果蔬菜、中草药等品牌；

(2) 开展科学灌溉与科技种养推广的试验；

(3)振兴村民的合作网络与村干的服务机制,建立“支农中心”机构。课题组立足于提升“农商文化”,引导“小农小商”向“大农大商”发展的方针,在边村组织村民开展了一系列具体的开发试验,如从农民的劳动组织结构到产供销机制,引导农民设法逐渐做大、做精。

以农为主,农商结合的经济模式,是边村居民为适应特殊的地理社会环境创造的一种文化类型。在这种模式下,农与商建立了一种天然的联系,两者缺一不可,农业的发展对边民的边贸活动有支撑的作用。而边贸的发展又对农业有带动的作用,对农村经济有重要的补充。当前边村农商文化面临的严峻考验,反映了小农小商与大农大商的冲突。所以,当务之急是,根据当地的实际,做好产业结构调整和产品结构的调整,发展规模经营,推动小农向大农,小商向大商发展。

4.2 那坡县水弄苗族教育文化振兴

那坡县水弄屯苗族考察点是本课题所设的6个考察点中经济发展滞后的一个,代表着中越边境最贫困的边区少数民族类型。那坡县是中国西南部典型的老、少、边、山、穷地区。该县地处边远山区,又是边防前线,在很长的时期内受中越战事影响,经济发展滞后,是广西28个国家级贫困县之一。分布在那坡县边境一线大石山区的苗、瑶、彝等少数民族的共同特点是人多地少、吃水难、行路难、农业生产条件十分恶劣,其中苗族社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又最为滞后。

4.2.1 水弄苗族社区特点

那坡县百省乡那布村水弄苗族屯92户442人,那坡苗族聚居点均位于大石山区,水源匮乏,土地贫瘠,按照世界银行对于人居住点情况评估的标准,属于“不适合人生活的地区”。2000年人均年收入只有350元左右。因此,那坡县政府将苗族聚居区作为扶贫工作的重点对象,从1998年开始,首先对几个居住条件特别恶劣的苗族聚居区进行异地安置。水弄苗族屯是政府为8个分散在山间居住点的92户苗民,专门在山脚建了砖瓦房供苗民居住。水弄苗民的传统生产包括作物种植、禽畜养殖以及狩猎、采集和少量在安置场附近帮壮族人打短工。由于文化低,生活封闭,对外界一无所知,使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有勇气走出社会打工。一般苗民的家产包括储存的粮食、饲养的禽畜和一些生产、生活用具外,别无长物。

水弄苗族传统文化保留比较完整,是父系和男权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妇女处于无权地位。赡养老人由最小的男儿负责。苗民讲究诚信、平和、宽容,内部团结、和睦,注重人际关系,生产生活上互相扶持帮助,内部有严格的口耳相传的习惯道德约束。以饮酒为主要娱乐和社交手段。由于环境封闭,以家庭传承教育为主,不重视接受现代基础教育。苗民儿童辍学较多,尤其是女童。苗民文盲者也很多。水弄屯有广东番禺支持修建的希望小学,但苗族孩子入学读书的波动性很大。由于教育落后,缺乏与现代文明的交流,所以传统文化的发展也缺乏动力,导致苗民社区日渐边缘化。

苗族崇尚巫术,每家每户每逢节庆都要在家里行祭拜之礼,认为祖宗的魂魄居住在家

茅屋正中搭建阁楼的横梁上。许多家庭还设立了神台，“做鬼”就是做巫事驱赶鬼邪。“做鬼”的人就是男性巫师——“公公”，他们是水弄苗民宗教信仰的代表人物，他们对水弄苗民生产生活无所不在的参与是水弄苗族宗教信仰的最大特点。

水弄苗民每年主要的传统节日庆典与周边壮族地区的大致相同，没有苗族特别的节庆，他们主要的节庆是过年（春节）、农历七月十四以及农历3月和8月的“风流街”。

“苗不离笙”，苗族人喜好歌舞，芦笙是最主要的乐器。水弄苗民闲暇和节庆喜爱弹奏乐器，主要有芦笙、月琴（四弦琴）、二胡等，弹奏的多是苗族山歌的曲调。与那坡县其它的苗族社区相比，水弄苗民的民间歌舞艺术水平较高，2000年那坡县举办第五届民族艺术节，百省乡在水弄社区组织了青年男女各10名，男子表演芦笙舞，女子表演弹琴，男女合作表演苗歌对唱，节目获得一等奖。

水弄苗民与越南苗民的往来一直频繁密切，其交往的主要方式是：到越南赶街；亲戚朋友往来；农忙时越南苗民过来帮工；越南苗民过境来出售土特产。水弄苗民缺乏商品观念，近两年由于安置新村的建立，苗民才逐渐扩大了与外界交往，开始有了商业意识的觉悟，个别人开始学卖猪肉。

4.2.2 振兴苗族教育的试验

课题组经过艰苦深入苗民调查访问，通过对水弄苗族社区经济、文化、教育发展状况的全面考察和分析，认为水弄苗区的最大特征是封闭性、传统性、边缘性。要从根本上改变此种状况，必须结合苗民传统文化的特点，振兴教育，发挥现代学校教育传播现代文明的功能和作用，提高苗民自信、自立的能力，并开展了促进水弄社区现代教育发展的4个项目实验活动：

(1) 办好当地苗族希望小学。提高入学率，让更多的适龄儿童享受到受教育的机会；改善学生在学习遇到的语言文化障碍，在教育内容的调整上，在国家统一的教材之外，针对水弄苗族学生们所缺失的知识体系编撰了辅助性乡土教材，使之成为水弄苗族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之间沟通的桥梁；

(2) 发展成人教育。对水弄苗区主要劳动力进行必要的培训，弥补他们教育机会的缺失，并将培训内容集中到最迫切的生产技术的传播和改进方面，课题组协助组织了多次对苗民的农技培训讲座。

(3) 水弄苗民传统的性别观念是亟待更新的传统观念，水弄苗族妇女是水弄社区的弱势群体，妇女群体低下的社会地位，阻碍了经济、文化发展，妨碍了社会公平的实现。课题组为水弄苗族妇女提供特别的辅导，提升她们在水弄社区的社会地位。

(4) 文化自觉是封闭的、边缘的、传统的族群发展的内部动力。课题组把展示苗族文化作为实验开发项目。利用“风流街”传统节日，举办苗族艺术节，以水弄苗族为主体，主办一台苗族文艺展演，让当地苗族同胞增加自信，让其他民族消除对苗族的偏见，实现各种文化的平等交流。

课题组还多次组织援助物资赠送给水弄苗族希望小学,包括有电脑、图书、文具学习用品和衣物,帮助他们建立了图书室,改善了学校的教学设备,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苗族孩子上学读书的困难。

水弄苗族是中越边境两侧极边极贫的少数民族典型,而且其数量并非少数,是极待支援救助的弱势群体,也是中越边境地区建设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

4.3 靖西旧州街壮族民间工艺品绣球的发展及越南高平省广渊县福莲乡安依族传统手工业发展的考察

这两个村点都是本课题开发民族手工艺文化的考察点。

4.3.1 旧州壮族绣球发展之路

靖西旧州壮族绣球工艺品的发展,是开发民族手工艺资源、形成文化产业的一个比较成功的典型。

靖西县是中越边境壮族人口占 99.73% 的壮族县,也是中国国家级贫困县。离县城 10 公里的旧州街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逐渐形成“绣球一条街”,近年达到年产 10 万个绣球,旧州街 530 户,2283 人,人均收入 2750 元,主要从事水稻种植业和运输业,以及绣球制作,其中 400 多户 1 千多人制作绣球,参绣者最小 9 岁,最大 80 多岁。2001 年全村社会总产值 400 多万元,其中绣球占 25%。如今,旧州绣球已成为名牌工艺品,可谓名扬天下,是旧州壮民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之一。绣球工艺的主力军是妇女,绣球的发展对壮族妇女实现自身价值、弘扬壮族优秀传统文化也有着重要意义。

从文献记载来看,绣球最初是壮族求偶传情的产物。目前我们已知最早有关绣球的记载始于宋代,(宋)周去非《岭外代答》云:“上巳日(三月三),男女聚会,各为行列,以五色结为球,歌而抛之,谓之飞絃。男女目成,则女受絃而男婚已定”。这段记载反映了春节或三月三歌节时,壮族青年男女到野外进行抛绣球活动,以绣球为媒择偶而婚的情景。

以绣球传情求偶的习俗至今仍有保留。每逢春节、三月三(有曰歌节)、中秋节等传统佳节,壮族青年男女相邀汇集村边、野外,分成男女两方,拉开适当的距离,互致问候后,开始对歌、抛接绣球,绣球成了壮族男女表达爱请的信物。

壮族先民在春耕前和秋收后等农闲时节,男女聚会以歌求偶时,为祈求和庆祝丰收,用布囊包裹着农作物种子抛接赠送,以祈子孙兴旺、五谷丰登。早期的绣球就在这样的理念下诞生了。大约到明代已具有现代绣球的雏形。现在的绣球是球状的,可早期的“绣球”却是棉子或一个包着豆粟或棉子等作物种子的小包。而后演变成用绣有莲花、鸳鸯等爱情吉祥物的绸巾包上重物连上丝绳而成。后又陆续由圆形变成现在瓣状立体式绣球。

绣球又是“吉祥之物”。壮族是传统的稻作民族,对每年农作物丰收与否十分关心。因而在各种祭祀、祈年的仪式中,农作物种子及播种、耕种等生产劳动形式往往都是表现的主题。抛绣球都是在每年春节及“三月三”歌节时举行,正是春播时节,绣球内填放有谷

物种子，就是希望年内“五谷丰登”之意；同时，绣球作为青年男女的定情之物，内中喻示着“生育兴旺”之意。绣球是因其有着丰富的地方和民族文化内涵而逐渐形成成为壮族标志物的。

课题组主要是深入民间工艺艺人，总结绣球开发发展的经验，开展绣球与壮锦发展的比较研究，总结政府对旧州绣球产业开发给予扶持指导的重要作用。分析绣球发展所面对的新的挑战，特别是研究探索民族民间工艺如何形成成为文化产业的途径，以及如何发挥民间工艺社团、协会等组织的作用，并向县政府提出了今后形成绣球文化产业的建议。课题组还协助政府组织了靖西县第一届绣球工艺大赛，以进一步激励工艺艺人的积极性，保护优秀的传统民族工艺技艺，扩大靖西旧州绣球的知名度，使旧州成为靖西旅游业的新亮点。

少数民族都有着丰富的民族传统文化，我们希望靖西壮族工艺品发展的成功经验，能成为其他民族开发工艺文化的借鉴，开拓脱贫致富之路。

4.3.2 福莲安依族发展手工炼铁业的典型

越南高平广渊县福莲乡是安依族的聚居地，传统文化保留很好，手工业发展突出，特别是炼铁锻制产品是当地的知名手工业产业。乡的中心村子匹昌村 1/3 的农户有来自炼铁业的收入，农闲时，几乎全村所有的男性劳动力都参加炼铁。福莲不仅炼铁手工业有名，其传统文化保护、林业资源与环境保护、农业生产中科学技术的应用，都比较先进，是越南北部山区发展经济的一种模式，是越南少数民族发展手工业产业的一个先进典型。

由于福莲人传统文化保护得好，所以保留了许多传统习俗和良俗新风，集体的团结性，传统的村规民约和共同的精神生活是安依人成功管理村寨的关键。福莲手工业的存在和发展不仅有经济方面的意义，而且还有对子孙进行劳动传统教育的意义。

现在炼铁业已经成为了福莲人主要的收入来源。它消除了由于土地有限、人口逐渐增加，土地越来越少而导致出现贫困问题的危机，为人们增加收入和改善生活起了较大作用。在炼铁业产品商品化之前，福莲农民的生活很困难，自从他们的铁制品发展成了商品，从炼铁业有稳定的收入，福莲安依人的生活有很大提高。

为了消除炼铁中毁林烧炭做燃料的现象，目前正在试行用煤代替木炭的办法并解决其中的环境污染问题。扩大产业规模，拓宽市场销路，传统技术与现代技术的结合，将古老的民族手工业产业与民族旅游相结合，这些都是福莲发展民族手工业要加以解决的问题，也是课题组的研究方向。

福莲安依族发展炼铁手工业产品的经验，对于中越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有示范意义。福莲的炼铁手工业，与旧州的绣球业，都向人们说明，民族手工业的开发是一条边区少数民族发展经济、脱贫致富的好办法。

4.4 越南新清乡的比较研究点

越南新清乡是本课题所设的 6 个考察点之一，作为与中方的类型研究点作比较研究而

设的考察点。

新清是越南谅山省文朗县的一个边境乡村，是与中国凭祥友谊边村相距很近的岱依族、依族越南少数民族的传统村庄，全乡人口 1700 人，其中岱依族人口占 48%，依族人口占 47%，越南主体民族越族人口仅占 5%。此外还有多于本地人口的外来人口。新清乡原来也是个封闭而贫困的村子，由于靠近边贸口岸，依靠边贸商业的带动，已逐步摆脱了极贫状况，正在探索传统文化如何与经济发展相结合。

选择新清乡作为比较研究点，是因为：(1) 新清与中国一侧的友谊边村仅仅一条国境线之隔，双方地理距离近，民族同源、跨境，文化习俗相同，新清的发展类型与特点，也与友谊边村大致相近，但发展的层次比友谊村后进，两者可以作比较。(2) 新清与友谊村一样，地处边贸口岸，边境贸易发育相对比较成熟、管理规范、发展层次较高、规模较大，村民经济与文化受边贸的影响很大；边境形势、两国关系，对当地的发展至关重要，两国两个边村的发展，可以说是两国关系的“晴雨表”，透过它们就可看到边境经济与文化互动的走势。(3) 新清与友谊村也各自具有不同的特性。由于分属两个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政策与国内形势影响下，两个边村的发展速度、模式都不尽相同。由于新清乡其文化的、农商的基础更薄弱，其乡土农商文化结合的起点不同，开展比较研究，可以使我们有一个更纵深的视野、角度了解边村的农商文化特点。

新清也与本课题中方的其他几个考察点都有不少可比较之处，比如，新清在经济迅速发展后，民族文化面临流失的状况，如原传统的住房干栏屋（高脚屋）改为平顶房，民族服装已很少人穿，许多民族节日也淡化了等等，与中国京族地区新出现的情况相同，甚至更为激烈得多，二者可以彼此借鉴；新清与中国水弄苗族考察点同是偏僻、贫困的山村，教育文化落后是共同的问题，是发展滞后的根源。如何开发教育文化，是新清与水弄苗寨、友谊边村都值得思考、实验开发和进行比较研究的，而水弄苗族比新清的教育发展基础还要低一个层次；新清依靠了紧邻边境口岸边贸的急速带动，有了一个突破口，这也带给人们一个有益的思考，看来，象新清、水弄这样原来经济发展滞后的少数民族地区，要发展，要摆脱贫困，必须振兴教育文化，必须找到一个发展经济的强力带动因素的冲击，其社会发展才能从一个较低层次快速提升进步。这是水弄苗族可借鉴的经验。

新清乡向我们展示了其作为本课题比较研究点的丰富内涵，对于中越边境两侧的处于不同发展类型的各民族村乡都有比较借鉴意义。

讨论

以上报告了本项福特基金项目的部分活动。限于篇幅，只着重介绍了我们在京岛点的开发试验体验，其余各点，只是简略带过。两年多的课题调研和开发试验给了我们启示良多，有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

(1) 如何思考文化资源的利用。所谓少数民族发展的文化思考，提出了如何用“文化”，

如何识宝、护宝、用宝的问题，如何从过去人们不经意的“文化资源”中开发出经济效益，为少数民族的脱贫致富开发新思路。这需要培养一种新的意识。各民族都有自己丰富的文化特点，但表现方式不一，开发的价值、难度不一，“文化思考”则帮助我们寻找闪光点、开发点。少数民族很寻常的生产生活方式，有的就是宝贵的可开发文化资源，稍加组织开发就是财富。各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习俗文化都有可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文化是民族的根，文化与经济的良性互动则是各民族走向现代化的载体。少数民族要发展，要追赶全国先进水平，文化思考为我们“独辟新径”指出了方向。事实是，许多少数民族正是依靠了文化资源的开发，走上了富裕路。这说明，民族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及其与经济的互动，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有没有“文化”战略意识是大不一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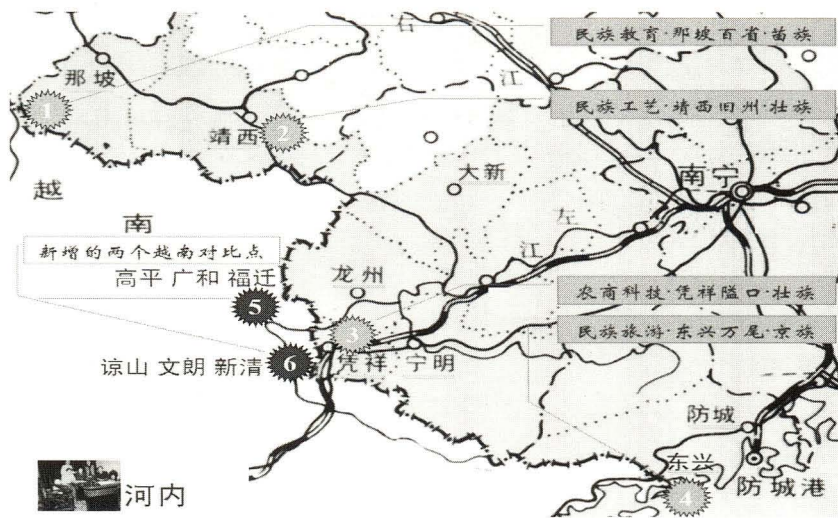
(2) 如何应对传统文化的流失。经济大发展，也给民族传统文化带来了大冲击，使传统文化面临衰退、流失，这是不可避免的，必须正确应对。所以对传统文化，哪些需要保护，要如何保护；哪些需要开发，如何开发；这些开发如何能获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形成良性互动，这些都是实际运作的难点，要有实践与理论结合的指导。传统文化要适应现代生活的发展，必须符合快捷（效率）、方便、时尚、创新等特点；文化开发要与经济互动，就要找到“卖点”和“互动”结合的条件。它提示我们，需要积极抢救保护即将消失的优秀民族文化遗产，也需要努力创新开发民族文化资源，实现与经济效益的良性互动，实现与社会效益的良性互动。但这种保护开发是有原则的，不能一切“向钱看”，不能见利忘义，急功近利，损害公益，不能使民族传统文化的开发庸俗化，或脱离生活的包装拔高，否则反而会对民族文化资源造成破坏，也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认可。

(3) 中越边境与东盟区域发展。中越边境地区，不仅对于中越两国关系发展十分重要，而且未来，随着东盟区域经济的发展和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更显现其作为东盟与中国的通道的重要性而引起世界注目。因此，建设一条和平、安定、繁荣、富裕的中越边境当是世人所望。本课题对于中越边境多个不同民族发展类型的分析研究和建议，对于实现上述目标是有重要意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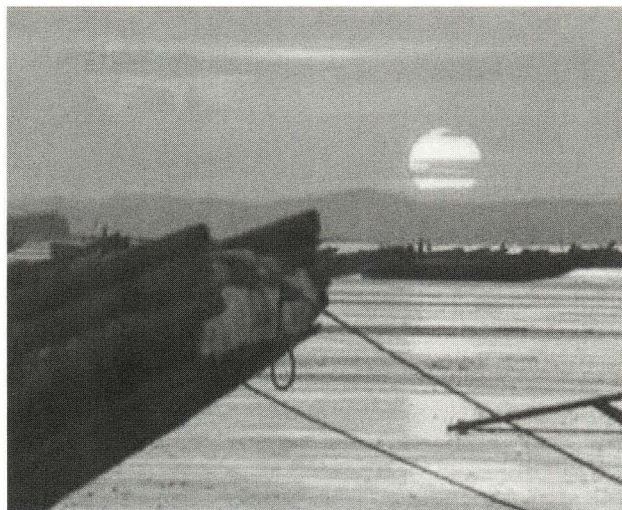
文 献

周建新

2002 《中越中老跨国民族及其族群关系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附图：(本项福特基金项目典型考察点分布图)



1、旭日初升的京族海滩



2、京族渔民拉大网



3、京族的哈亭



4、京族的家庭神坛



5、参加哈节的京族姑娘



6、京族独弦琴村民琴师



7、进行京族喃字培训



8、采访友谊边村联包的村民



9、向水弄苗族希望小学捐赠物品



10、著名壮族女艺人王肖琴（左一）的参赛作品



11、越南福莲村村民的染布技艺

